

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

丁 雨

关键词：东非沿海地区 伊斯兰釉陶器 中国陶瓷 文化交流

KEYWORDS: East African Coastal Area Islamic Glazed Pottery Chinese Ceramic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BSTRACT: The Islamic glazed pottery unearthed in the East African coastal are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exotic objects unearthed locally. The Islamic glazed pottery wares unearthed in this area have given categories. Seen from the unearthing statuses in all of the sites, the 11th and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ies were the climaxes of the importing of the Islamic glazed pottery to the East African coastal area.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slamic glazed pottery and Chinese ceramics unearthed in the East African coastal area showed that the Islamic glazed pottery indirectly prove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ceramics as the carrier to the East African coastal area even the Middle East.

多年来，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了大量来自海外的遗物，说明了该地区具有参与海外贸易的历史传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地区同时也是古代中国陶瓷的重要销售地之一。就该地区出土的古代外来陶瓷制品而言，除中国陶瓷制品外，还包含有来自西亚、印度半岛和东亚其他地区的产品。所以，要从整体视角观察东非沿海地区的古代对外贸易，分析古代中国商品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则必然要将该地区古代遗址内出土的遗物与其他地域的遗物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对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公元9~15世纪的伊斯兰釉陶器予以介绍，并结合同时期该地区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制品进行比较分析。

从英国学者柯克曼（J. S. Kirkman）1948年首次在肯尼亚格迪（Gedi）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开始，伊斯兰釉陶器不断出土于东非沿海的众多遗址之中。柯克曼将所发现的伊斯

兰釉陶器分为红胎、浅黄胎、灰胎、白胎四类；在四类之下，根据釉色和器形，又将其分为22组。柯克曼认为，这些伊斯兰釉陶器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是古波斯生产的，其中一些来自法尔斯（Fars）行省；还有一些应该与中东地区古港口西拉夫（Siraf）遗址相关，这里曾经是此类陶器的集散地之一。柯克曼指出，在公元15~16世纪，伊斯兰釉陶器的装饰图案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影响，同时列出了格迪遗址出土的可能受到中国影响的几组釉陶器^[1]。柯克曼的分类成为此后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虽然在实际叙述中，他并未在进一步的细分中形成明确的标准。

20世纪70年代，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学者奇蒂克（N. Chittick）对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器进行的研究，形成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分类方式。结合当时在中

作者：丁雨，北京市，10087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东、东非沿海地区的发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2]，他将基尔瓦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分为15组。而从大类上看，这15组又主要可归入萨珊-伊斯兰釉陶器（Sassanian-Islamic Ware）、锡釉陶器（Tin-glazed Ware）、剔划釉陶器（Sgraffiato Ware）^[3]、黄地黑彩釉陶器（Black-on-yellow Ware）、单色蓝绿釉陶器（Islamic Monochrome Ware）、拉斯特器（Lustre-Ware）等几种类型^[4]。奇蒂克对器形的描述不多。英国学者马克·霍顿（M. C. Horton）对肯尼亚上加（Shanga）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器的分析延续了奇蒂克的做法，但也有改良。他根据已有的伊斯兰釉陶器分类方式，将釉陶器分为10组，各组下又根据器形、装饰进行更细致地划分^[5]。此后学者的研究方法与马克·霍顿大致类似，同时在大类的划分方面，又与奇蒂克的分类方法趋同，更细致的划分中则又有不同的标准。

一、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伊斯兰釉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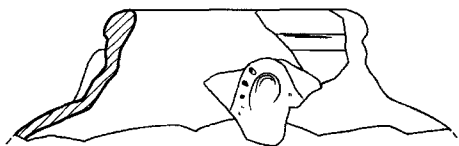
从目前东非沿海地区已经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来看，由于各遗址的兴起、繁盛时间略有差别，发现的各类伊斯兰釉陶器，在数量上略有差异，但在种类上大体一致，这表明东非沿海地区在面对海外物品时有着近似的审美品好，或者表明各古代聚落的贸易对象来自相近的区域。下面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于2010~2013年随北京大学考古队在肯尼亚的实地调查和发掘成果^[6]，对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伊斯兰釉陶器的主要种类进行介绍。

（一）萨珊-伊斯兰釉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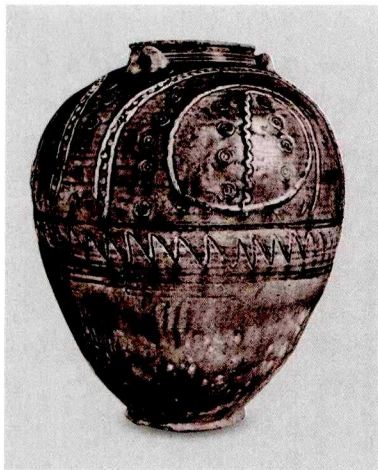
萨珊-伊斯兰釉陶器虽然以“萨珊”命名，但这一命名仅表明这种釉陶器受到萨珊王朝的影响^[7]。它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流行年代要晚于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这种釉陶器多出土于东非沿海地区公元8~10世纪的地层中。在肯尼亚的上加、曼达（Manda），坦桑尼亚的安古贾·乌库

（Unguja Ukuu）等兴起较早的遗址中，釉陶器的出土数量较多；而在兴起较晚的基尔瓦遗址，出土数量较少。这种釉陶器胎质较致密，胎色多为赭红色，器表常施近似于绿松石颜色的蓝绿碱性釉，内部施蓝釉、绿釉、黑釉；装饰方面，器表釉下常刻划锯齿状纹饰，并贴塑带状、点状纹饰；器形以罐为主，包括长颈罐、矮颈罐，也有碗等器形。殊为可惜的是，目前为止，东非沿海地区的遗址中尚未出土较为完整的此类釉陶器标本。在上加遗址出土有1件釉陶罐口沿残片，口部微敛，斜肩，颈部有耳，复原口径17厘米^[8]（图一）；从残片的特征观察，与法国卢浮宫收藏的萨珊-伊斯兰釉陶罐应该是同类器物^[9]（图二）。此外，出土于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遗址、时代约为公元9世纪的釉陶罐亦应类似上加遗址出土残片的完整器形^[10]（图三）。

这种釉陶器分布十分广泛，除东非沿海地区以外，从埃塞俄比亚、红海地区到南亚大陆都有发现。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遗址^[11]，伊朗的西拉夫遗址^[12]、苏萨（Susa）遗址^[13]，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遗址^[14]，以及菲律宾安巴高地区的遗址中^[15]，均有出土。在中国沿海地区一些晚唐五代时期的遗址中，也出土有产自中东地区的蓝绿釉陶罐，与上述釉陶器当属同一类型。如福建五代闽国刘华墓出土的三件釉陶器，发掘者称之为孔雀蓝釉陶瓶^[16]（图四）。三件器形基本一致。均为圆唇，小口，溜肩，鼓腹，下腹斜直，小底外撇。器表均有绳状贴塑纹，装饰图案及方法与西拉夫遗址出土釉陶器类似。此外，扬州^[17]、宁波^[18]、桂林^[19]等地也出土有类似的釉陶罐。经科技检测，中国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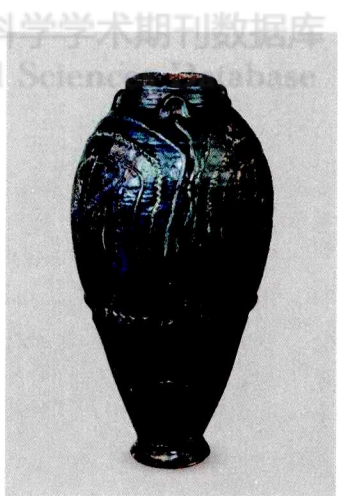
图一 上加遗址出土萨珊-伊斯兰釉陶器残片



图二 萨珊-伊斯兰釉陶罐
(法国卢浮宫藏)



图三 伊拉克泰西封遗址出土
萨珊-伊斯兰釉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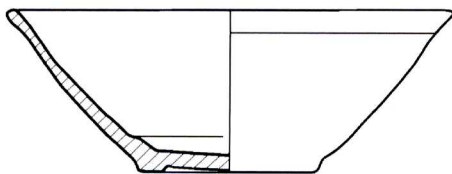


图四 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
Ⅱ式釉陶瓶

这些釉陶器不仅外形、装饰上，与中东、东非地区同类器相似；并且胎和釉的化学成分也与之近似，均为碱釉陶，这与中国同时期的铅釉陶差别很大^[20]。

(二) 锡釉陶器

“锡釉陶”的名称由英国学者亚瑟·莱恩 (Arthur Lane) 于1947年提出。他认为中东陶工将氧化锡和铅釉调和而产生了这种白釉，其目的在于模仿唐代的白釉^[21]。奇蒂克沿用了莱恩的说法。但马克·霍顿认为，并无证据表明此类釉陶器的釉中含锡^[22]。其器形以白釉陶碗 (图五) 为主，还有盘等^[23]。此类釉陶器一般胎色淡黄，白色釉面亚光，多有裂纹，易剥落，其中一些有蓝、绿、黄色点彩。在东非沿海遗址中，这类器物主要集中出土于公元9~10世纪的地层，在肯尼亚的曼达、上加和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 (Zanzibar) 等遗址出土较多，基尔瓦遗址出土不多。



图五 肯尼亚上加遗址出土白釉陶碗

除此以外，这类釉陶器还出土于伊拉克的萨马拉 (Samarra) 和伊朗的西拉夫、苏萨遗址等。奇蒂克认为其浅底碗的造型来自于对同时期中国白釉瓷碗的模仿^[24]。

(三) 剔划釉陶器

剔划釉陶器是指先在陶胎上施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进行剔划，形成装饰，再施透明釉或蓝绿釉的釉陶器制品。其胎色多为赭红色。器形以碗为主，亦有盘、杯、罐等。常见的装饰手法包括浅刻、剔花、阴影刻划等，装饰花纹多为简易的花草纹、几何纹、阿拉伯文字纹等。

这种剔划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出土数量很多，是这一地区最常见的伊斯兰釉陶器种类。一般被分为早期剔划釉陶器和晚期剔划釉陶器两种。

早期剔划釉陶器 (Early Sgraffiato Ware) 多为赭红或浅黄胎，胎质较软，施化妆土，外施黄、绿釉。器类包括碗，盘，亦有罐。一般在碗、盘内里浅刻花卉纹或抽象图案，形式相对简单。由于胎釉结合不佳，表面剥釉、脱彩现象普遍严重。与晚期剔划釉陶器相比，此类釉陶器出土数量不大。在肯尼亚的上加遗址、坦桑尼亚的安古贾·乌库遗址有零星发现，而在肯尼亚的曼达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遗址均未

出土。在上加遗址，此类釉陶器最早出现的地层年代约为公元10世纪；而西拉夫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年代大致归属在公元9~10世纪。怀特豪斯（D. Whitehouse）认为西拉夫遗址出土的此类釉陶器可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25]。马克·霍顿则认为，这类釉陶器可能是模仿公元9~10世纪中国唐三彩的产物^[26]。

晚期剔划釉陶器（Late Sgraffiato Ware）的胎色与早期剔划釉陶器类似，但装饰图案及方法比早期剔划釉陶器略显复杂。从目前来看，此类釉陶器应主要为公元10世纪中期以后的产品，年代略晚，因此被称为“晚期剔划釉陶器”。此类釉陶器包括的种类很多，常见类型有三种：普通剔划釉陶器（Simple Sgraffiato Ware）、阴影线装饰釉陶器（Hatched Sgraffiato Ware）和剔花装饰釉陶器（Champleve Sgraffiato Ware）。

普通剔划釉陶器的釉色以绿釉为多，器表仅有刻划装饰，无剔花；此类釉陶器在东非沿岸普遍出土。如肯尼亚的曼布鲁伊（Mamburi）遗址出土的1件釉陶器残片（12MGT3④：331），疑为大盘底部，胎较厚且质地细密，火石红色。内壁施化妆土，然后刻划出花草纹，刻划深度未穿透化妆土；在化妆土上施透明绿色釉，绿釉在刻划纹上有积釉现象，使线条呈深绿色。残片外壁无釉，外底较平，有轮制痕迹。残长17.3、残宽9.2厘米（图六）。

阴影线装饰釉陶器最大的特点是以密集的平行阴影线作为图案的填充装饰。黄釉者较多，伴有绿色、棕色点彩。装饰图案包括古阿拉伯文字、缠枝花纹等。上加遗址中出土的此类釉陶器流行于11世纪至12世纪末^[27]，有学者认为，此类釉陶器的流行时期或可迟至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28]。如坦桑尼亚基尔瓦遗址出土的1件釉陶碗口沿标本，圆唇，敞口，器内施化妆土，再施黄绿釉。火石红胎较细腻。碗内图案均匀分成若干部分，在各部分中刻画花草纹，并间隔在

花草纹中填充阴影线^[29]（图七）。同类器物在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老城遗址也有出土。

剔花装饰釉陶器则以剔花装饰为特色，伴有刻划纹。剔花、刻划纹处均露出赭红色胎，与表面的黄、绿釉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对比效果。剔花装饰技术在中东地区被认为流行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30]。在肯尼亚的上加遗址，此类釉陶器的流行时间晚于阴影线装饰釉陶器，约开始于11世纪，流行至14世纪^[31]。肯尼亚的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1件黄绿釉碗（10MAT14⑥：1）有这种典型的剔花装饰。敞口微侈，圆唇，斜直腹微曲，足端向内斜收，外底中心有饼状凸起。外部仅口沿施釉，有流釉现象，内部口沿处施绿釉，腹部施黄釉。火石红胎较细腻。口沿下及内底各有一组双圈纹，两组圈纹之间有剔花装饰，应为阿拉伯文字，但难以辨认。口径



图六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普通剔划釉陶器残片（12MGT3④：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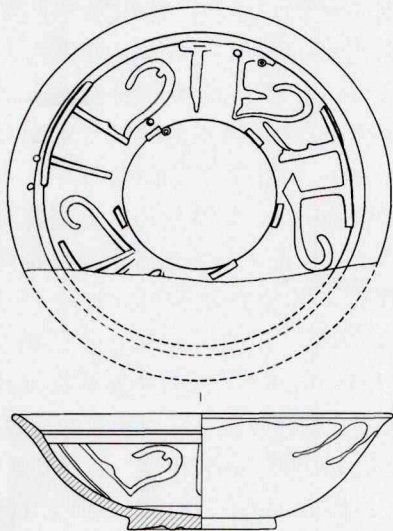
图七 坦桑尼亚基尔瓦遗址出土阴影线装饰釉陶碗口沿残片

25.6、底径8、高8厘米（图八）。

公元9~12世纪，釉陶器的剔划技术在东中东地区非常流行，并对意大利等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剔划类器物在10世纪晚期被引入伊朗东北地区^[32]。马克·霍顿认为东非沿海地区的晚期剔划釉陶器可能产自伊朗南部，并专门用于外销^[33]。从地层证据看，早期剔划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的使用可早至10世纪，而晚期剔划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流行则始于11世纪。从质量上看，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剔划釉陶器，不如伊朗内沙布尔（Nishapur）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

（四）黄地黑彩釉陶器

目前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黄地黑彩釉陶器，从器形上看，多为大碗。其胎色多为火石红，胎质较疏松，偶见气孔及石英等杂质。器物内外施淡黄釉，外壁一般施釉到口沿以下，釉层薄，易脱落；釉上一般用黑彩绘出线状纹饰，以波浪纹、连拱纹、下垂三角纹为主。此类器物在东非沿岸的古代聚落遗址中分布极为普遍，出土标本大多釉面磨损严重。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了1件较为完整的黄地黑彩釉陶碗（12MGT3④：2），胎色火石红，胎质



图八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黄绿釉剔花碗
（10MAT14⑥：1）

略疏松。敞口，平沿外折，圆唇，斜直腹，圈足，足根较窄，外底微鼓。外壁无釉，内壁施黄釉，上有黑彩，为多角纹，内底微凹。口径24.4、底径9.6、高8.8厘米（图九）。

综合曼达、基尔瓦、上加、马林迪老城等遗址的考古资料来看，黄地黑彩釉陶器出土地层的年代约在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其出土数量相对于剔划类釉陶器和单色蓝绿釉陶器较少，流行时间不长，因此具有较强的断代意义。这种釉陶器的产地可能在也门亚丁附近的坎法尔（Khanfar）^[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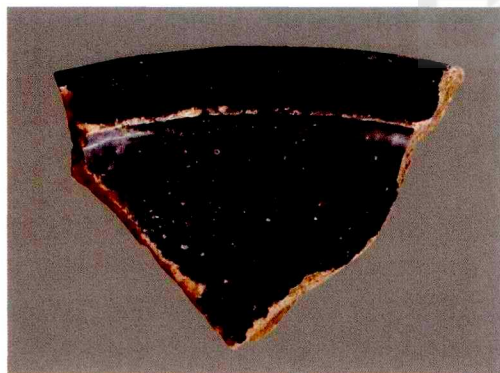
（五）单色蓝绿釉陶器

此类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遗址的晚期地层中极为常见。从14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流行，在17世纪的文化层中仍有普遍发现。在肯尼亚的上加遗址，此类釉陶器从14世纪中期至15世纪早期均有发现，可占到外来陶瓷遗物总数的57%^[35]；可分为浅绿釉、深蓝釉、灰绿釉等几种类型，器形有大、中、小三类，器内施满釉，器外施釉仅至口沿以下，多无纹饰。

马林迪老城遗址出土有多件单色蓝绿釉陶器残片。其中1件碗口沿标本为敞口，圆唇内斜，有凸棱，斜直腹微内曲；蓝釉，釉面光亮，有凹凸痕迹，内外均施釉，外部施釉仅至口沿下方；火石红胎较细密；复原口



图九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黄地黑彩釉陶碗
（12MGT3④：2）



图一〇 肯尼亚马林迪老城遗址出土蓝釉陶碗口沿残片(13CET1③C:600)

径17.4、残高3.7厘米(图一〇)。

这种单色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非常流行,但在其他地区发现不多。目前仅在阿联酋的佐尔法(Julfar)^[36]、埃及的库萨尔·卡蒂姆(Quseiral-Qadim)^[37]等少量遗址中,有类似的遗物发现。马克·霍顿认为这种釉陶器可能源自红海或阿拉伯南部地区^[38]。与同时期埃及、叙利亚乃至后来奥斯曼帝国富有色彩的釉陶器相比,这种釉陶器显得更为朴素。此外,有关这种釉陶器的研究很少见于伊斯兰釉陶器的专项研究之中。

二、相关问题探讨

(一) 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阶段性

从伊斯兰釉陶器本身的庞大体系来看,东非沿海地区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的种类只占到其中很小一部分。但从该区域出土外来陶瓷遗物的总量来看,伊斯兰釉陶器则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以聚落存续时间较长的肯尼亚上加遗址(公元8世纪中期至15世纪初期)为例,该遗址探方6~10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约占外来陶瓷的80%,中国陶瓷仅为3%^[39]。从典型东非沿海遗址伊斯兰釉陶器的出土情况中,我们有可能对伊斯兰釉陶器输入东非沿海地区的阶段性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该地区对外交流情况更全面的认识。

上加遗址是在东非沿海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成熟阶段、由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马克·霍顿主持发掘的典型遗址。他对上加遗址出土的外来陶瓷遗物分类、分阶段进行了统计,为研究8世纪至15世纪初期东非沿海聚落输入伊斯兰釉陶器提供了系统材料。

马克·霍顿将上加遗址的考古资料分为探方1和探方6~10两个部分予以披露,两处堆积层位不完全统一。依据上述材料,马克·霍顿判定上加遗址的主要存在时间为公元760~1425年,并将这一遗址分为11期。

为便于讨论,本文选取探方6~10的材料予以列举和重新分析。同时综合发掘结果,将探方6~10在11期中分别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片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表一)^[40]。

陶片统计较好的做法是分类后,结合陶片总重量、器形制定统计方案。不过考虑到埋藏条件下,出土陶片的破碎程度大体仍然符合统计规律,因此单纯统计陶片数量,也可作为一定的参考。另外,器物输入时间应略早于埋藏时间。为便于论证,我们假定出土遗物的埋藏时间能够约等于它输入到上加遗址的时间。

我们可用每一期段文化堆积单位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片总数,除以每一期段的年数,所得到的数据,大体上可供我们评估各期段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规模。将上加遗址探方6~10内出土的6127片釉陶片平均到公元760~1425年之间的665年中,可以得到平均值为9.21,将其作为区分高峰与低谷的参考值。由此可将该遗址伊斯兰釉陶器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划为四个时段,即公元760~1050年、1050~1250年、1250~1325年、1325~1425年。不过,从数据来看,公元1000年之前陶片数量除以年数的指数在3以下;至公元1000~1050年这一阶段则跃升为8以上,虽然未达到平均值9.21,但变化较大。此后又持续增长。似应以公元1000年为界,将公元760~1050年这一阶段分开,并将公元

表一

肯尼亚上加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器分类统计表

| 种 类 | 分 期 | | | | | | | | | | | | 总 计 |
|----------|--------------------|--------------------|--------------------|---------------------|----------------------|----------------------|----------------------|----------------------|----------------------|----------------------|----------------------|------|-----|
| | 公元 760~ 780年 | 公元 780~ 850年 | 公元 850~ 920年 | 公元 920~ 1000年 | 公元 1000~ 1050年 | 公元 1050~ 1075年 | 公元 1075~ 1250年 | 公元 1250~ 1325年 | 公元 1325~ 1375年 | 公元 1375~ 1400年 | 公元 1400~ 1425年 | | |
| 萨珊-伊斯兰釉陶 | 24 | 68 | 138 | 86 | 54 | 59 | 137 | 25 | 17 | 7 | 3 | 618 | |
| 锡釉陶 | | 41 | 42 | 43 | 28 | 45 | 22 | 1 | 2 | 4 | 2 | 230 | |
| 剔划釉陶器 | | | 1 | 30 | 362 | 694 | 2091 | 442 | 466 | 182 | 36 | 4304 | |
| 黄地黑彩釉陶器 | | | | | | | 10 | 43 | 153 | 155 | 54 | 415 | |
| 单色蓝绿釉陶器 | | | | | | | 1 | 8 | 41 | 206 | 198 | 454 | |
| 其他 | | 4 | 7 | 8 | 3 | 2 | 7 | 13 | 7 | 36 | 19 | 106 | |
| 总计 | 24 | 105 | 186 | 161 | 437 | 782 | 2241 | 527 | 686 | 590 | 311 | 6127 | |
| 陶片数量/年数 | 1.2 | 1.5 | 2.65 | 2.01 | 8.74 | 31.28 | 12.8 | 7.02 | 13.12 | 23.6 | 12.44 | 9.21 | |

1000~1050年这一阶段与此后阶段结合。另据发掘情况，马克·霍顿判断在公元1050~1075年这一阶段，上加遗址遭遇了一次毁弃。因此，似应当将公元1050~1250年以公元1075年为界，划分开来。

综合考虑伊斯兰釉陶器的出土情况、遗址发展变迁等情况，我们或可将上加遗址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760~1000年，这一阶段上加遗址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数量不多，种类以萨珊-波斯釉陶器为主，并有锡釉陶器和少量剔划类釉陶器。

第二阶段：公元1000~1075年，输入到上加遗址的伊斯兰釉陶器数量上升并达到高潮；剔划釉陶器数量明显增多，萨珊-波斯釉陶器比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第三阶段：公元1075~1250年，伊斯兰釉陶器年均输入数量略有下降，不过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剔划类釉陶器是最为重要的输入产品，萨珊-波斯釉陶器和锡釉陶器仍然出现，不过比重大幅下降。黄地黑彩釉陶器和单色蓝绿釉陶器开始出现。

第四阶段：公元1250~1325年，伊斯兰釉陶器输入数量继续回落，陷入一个较小的低谷。剔划类釉陶器仍占较大比重，黄地黑彩釉陶器和单色蓝绿釉陶器的比重开始提升。

第五阶段：公元1325~1425年，伊斯兰釉陶器的输入达到第二个高潮，单色蓝绿釉陶器比重大幅上升，黄地黑彩釉陶器比重有

所上升，后至15世纪开始急剧下降，剔划釉陶器的比重则急剧下滑。

上加遗址的情况部分反映出，在11世纪和14世纪末，曾经出现过两个向本地区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高潮。10世纪正是中东和东非地区联系加强的时段，据研究，公元950年（另说为公元975年），设拉子（Shrazi）的苏丹王子带领一批阿拉伯人去了东非海岸^[4]。这一时间段刚好略早于上加遗址所见的第一次伊斯兰釉陶器的“输入高潮”。考虑到遗物埋藏与“真正输入”的时间差，这种交流与联系的加强，可能正是伊斯兰釉陶器出现输入高潮的重要原因。

13~14世纪上加遗址伊斯兰釉陶器的低潮，除了与聚落本身的突然毁弃存在一定关系，也有可能东非沿海地区古代社会内部格局的变化有关。肯尼亚拉穆（Lamu）群岛虽处于平稳或恢复发展中，但其发展速度和重要性被基尔瓦与蒙巴萨（Mombasa）相继超越，其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可能有所下滑。上加遗址在15世纪初迅速衰落，则导致由单色蓝绿釉陶器主导的伊斯兰釉陶器输入高峰戛然而止。

单个聚落输入外来商品的情况，在产地-流通-市场这一链条中，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不过，在考古报告披露资料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对单个聚落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阶段性分析，或能为我们认识公元8~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伊斯兰釉陶器的情况提供部分参考。



（二）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中国瓷器与伊斯兰釉陶器的阶段性比较

据发掘报告，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片389片，其中探方6~10出土277片，经整理，大体情况见表二^[42]。

运用与上文分析伊斯兰釉陶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加遗址有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中密集出土中国瓷片。在公元1050~1075年的文化堆积中，中国瓷片出土略显密集。在公元1325年之后，以龙泉窑瓷器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该遗址相关的遗迹单位中。

对比上加遗址出土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上加遗址密集出土两种陶瓷器的文化堆积时段有重合之处。比较两个输入高峰时段，我们会发现在公元1000~1075年这一阶段，伊斯兰釉陶器的出土更为密集，上升态势更为猛烈。而中国瓷器相关出土遗物的增长则较为缓慢。而在后一个外来陶瓷输入高峰中，尽管伊斯兰釉陶器仍然占据数量优势，但中国瓷片的比重却有明显提高。这或许表明在公元1325~1425年，由于航海技术进步和此前蒙古人势力的对外扩张，以龙泉窑产品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在东非乃至印度洋地区的陶瓷市场上取得了更为强势的地位。

不过，值得思索的是，此前学界多认

为，在15世纪前，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中国陶瓷的高潮为晚唐五代和南宋末至元初，并认为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11世纪至13世纪中叶）为古代中国瓷器贸易的低潮时期^[43]。表二中显示的结果却与这一观点略有矛盾，其中应有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中国瓷器外销发展趋势的分析多立足于对产地或路线分析，如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瓷窑发展情况、航路的通畅状态等。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因素对外销商品的流通存在影响。

根据马克·霍顿对上加遗址的分期，该遗址的居住形态经历了数次转变。在一至三期（公元760~920年）为仅有木质房屋的小聚落，到第四期（公元920~1000年）开始出现石质房屋，第五期（公元1000~1050年）开始出现大型石质清真寺，而在第六期（公元1050~1075年），上加遗址遭遇了一次毁弃。从第七期至第十一期，遗址得以重建并逐渐兴盛，直至15世纪初突然废弃时，仍保持着兴盛的状态^[44]。对比外来陶瓷的输入数量和聚落兴衰变化，可以看出一般聚落兴盛时，出土外来陶瓷数量较多；聚落衰落时，出土外来陶瓷数量较少。这表明两种外来陶瓷的输入趋势与上加的兴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或可认为，销售市场地的兴衰对外来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或可对于表二与此前观

表二 上加遗址出土中国瓷片分类统计表

| 分期 种类 | 公元 760~ 780年 | 公元 780~ 850年 | 公元 850~ 920年 | 公元 920~ 1000年 | 公元 1000~ 1050年 | 公元 1050~ 1075年 | 公元 1075~ 1250年 | 公元 1250~ 1325年 | 公元 1325~ 1375年 | 公元 1375~ 1400年 | 公元 1400~ 1425年 | 总计 |
|----------|--------------------|--------------------|--------------------|---------------------|----------------------|----------------------|----------------------|----------------------|----------------------|----------------------|----------------------|------|
| 青白瓷 | | | | | 1 | 3 | 18 | 1 | 2 | 3 | 1 | 29 |
| 越窑瓷器 | | | 4 | 3 | 2 | 7 | 15 | | | | | 31 |
| 龙泉瓷 | | | | | 1 | 1 | | 4 | 25 | 77 | 41 | 149 |
| 橄榄绿釉罐 | 1 | 1 | | 2 | 1 | | 2 | | 1 | | 1 | 9 |
| 浅棕釉青瓷 | | | | | | 1 | | 1 | 9 | 16 | 4 | 31 |
| 模制白瓷 | | | | | | | 1 | 1 | 1 | 1 | | 4 |
| 灰绿釉器 | | | | | 1 | | 1 | | | | | 2 |
| 白瓷 | | | | | 4 | | | | | | | 4 |
| 定窑瓷器 | | | | 1 | | 1 | 2 | | | | | 4 |
| 长沙窑瓷器 | 2 | 4 | 8 | | | | | | | | | 14 |
| 总计 | 3 | 5 | 12 | 6 | 10 | 13 | 39 | 7 | 38 | 97 | 47 | 277 |
| 瓷片数量/年数 | 0.15 | 0.07 | 0.17 | 0.07 | 0.2 | 0.52 | 0.31 | 0.09 | 0.76 | 3.88 | 1.88 | 0.42 |

点的矛盾之处略作解析。首先，在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上边遗址的聚落形态尚不够繁荣，由此影响了对外贸易；其次，遗物的生产、输入和埋藏存在时间差，这种情况在中国瓷器这种珍贵的外来商品上应该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表二来看，公元1050~1075年之间，出土数量较多的是越窑产品，但结合中国陶瓷制品的生产状况以及上文所述的情况，不能排除这一阶段文化堆积中的越窑瓷器输入时间偏早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原来认为的晚唐五代输入高峰的不显著或者推迟。

表一和表二相对比，可知东非沿海聚落输入的外来陶瓷制品中，伊斯兰釉陶器与中国陶瓷在数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曼达、基尔瓦、马林迪老城等多个遗址中。在同一遗址中，伊斯兰釉陶片的数量往往是中国瓷片数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但从出土规律来看，中国陶瓷和伊斯兰釉陶器的集中分布区域不同，在东非沿海地区遗址中的作用也应不同。中国陶瓷的出土分布范围，更集中于聚落中的高等级建筑分布区域，表明其与聚落中的高等级人群或重要场所有更紧密的联系。

（三）两种外销陶瓷的关联

东非沿海地区输入的来自中国和中东的外销陶瓷有特定的种类。两种外销陶瓷形态上看似差别明显，实质上却存在着一些联系。

从器形与装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输入的伊斯兰釉陶器似乎大量借鉴了中国陶瓷的元素。坦桑尼亚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色锡釉陶浅底碗，其造型被认为是仿自中国白瓷^[45]，相似的器物有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剔划釉陶碗^[46]（图一一），以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上出土的绿彩白釉碗^[47]（图一二）。剔划釉陶器使用的阴刻技法被认为是仿自晚唐铅釉陶器或越窑瓷器^[48]，而其表面的釉色则被认为与中国的三彩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9]。谢明良认为，伊斯兰

釉陶器对剔花技术的采用可能也受到了中国陶瓷的影响^[50]。

不仅如此，伊斯兰釉陶器对化妆土的采用，也被认为是在胎质不佳情况下，模仿中国瓷器而采用的办法^[51]。13~14世纪，在蒙古人扩张和印度洋贸易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伊朗等地多种陶瓷生产受到了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来自龙泉窑^[52]。从器形和釉色来看，在14世纪末，东非沿海地区开始流行的单色蓝绿釉陶器，可能借鉴了龙泉窑瓷器；而埃及地区则在15世纪极力仿制龙泉窑产品。种种情况表明，在器形、釉色、装饰技术乃至审美理念上，东非沿海输入的多种伊斯兰釉陶器都对中国的陶瓷进行了仿效。

不过，有两个现象耐人寻味。首先，尽管在东非沿海地区输入的伊斯兰釉陶器在多个方面模仿了中国陶瓷制品，但是其模仿的一些陶瓷器原型，却极少在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例



图一一 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铅釉剔划釉陶碗



图一二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黑石号”沉船出土绿彩白釉碗

如唐三彩。其次,中国陶瓷在生产过程中也受到了伊斯兰因素的影响,譬如13~14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对龙泉青瓷的影响^[53],苏麻离青传入中国对青花瓷生产的影响^[54]。但这些来自伊斯兰的因素却并未直接影响伊斯兰釉陶器自身的生产,而是先促成了中国陶瓷的创新,再由中国陶瓷器启发伊斯兰釉陶器造型、装饰的新思路。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

从总体趋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印度洋贸易中,陶瓷贸易的总体方向是由东向西扩散。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地的港口地区,目前均有中国外销瓷的发现。而中国则鲜有西方外来陶瓷商品输入,仅在唐代港口遗址零星出土了少量萨珊-伊斯兰釉陶器^[55]。而这种扩散趋势,不仅表现在商品传播的层面上,也表现在陶瓷技术、审美等层次上。

如上所述,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多种伊斯兰釉陶器均表现出与中国陶瓷的联系。而东非沿海遗址的出土遗物表明,在吸收了一定中国陶瓷元素之后,中东地区的陶瓷工匠创新生产出的伊斯兰釉陶器继续向西方外销,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文化影响。中国古代陶瓷由东向西的强势扩散和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本国商品的出土物上,也间接地隐藏在伊斯兰釉陶器之中。

三、结 语

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主要包括萨珊-伊斯兰釉陶器、锡釉陶器、剔划釉陶器、黄地黑彩釉陶器、单色蓝绿釉陶器等几大类。这些釉陶器在东非沿海地区有特定的流行时代。

通过对上加遗址出土外来陶瓷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釉陶器和中国陶瓷器在输入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别,且在输入高峰时期各自所占比重也存在着变化,这表明东非沿海地区与中东地区应存在着更为密切、频繁的交流。上加遗址输入伊斯兰釉陶

器高潮、低谷的变化,应同时受到了古代中东地区政局、东非沿海与伊斯兰地区关系、东非沿海地区局部形势和上加遗址本身兴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东非沿海地区输入的多种伊斯兰釉陶器在器形、装饰技法方面可能都受到了中国陶瓷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伊斯兰釉陶器间接地证明了以陶瓷器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东非沿海乃至中东地区的潜在影响。

附记: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9~15世纪斯瓦西里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编号16CKG016)的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编号15ZDB05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斯瓦西里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编号2017T100046)的资助。

注 释

- [1] Kirkman, J. S.,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pp. 85-10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2] a. 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6*, pp.1-22, 1971.
b.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pp.8-9,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3] “Sgraffiato”一词应主要用来指代剔刻技术或使用此类技术装饰的陶瓷。
- [4] Chittick, H.N.,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2-316,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74.
- [5]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1-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6] a. 秦大树等:《2012年度中国和肯尼亚陆上合作考古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4月26日。
b. 秦大树等:《2010年度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及主要收获》,见《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 (20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 c. 秦大树、丁雨:《肯尼亚滨海省曼布鲁伊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主要收获》, 见《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
- [7] 同[2]b。
- [8]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4,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9]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p.9-13,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10] [日]三上次男主编:《世界陶瓷全集》第21册第153页, 小学馆, 1986年。
- [11] Munro-Hay, S. C., *Excavations at Aksum*, pp.315-31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89.
- [12] 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6*, p.14, 1971.
- [13] Kervran, M., *Le Niveaux Islamiques du Secteur Oriental du Tepe del Apadana, Cahieres de la Dele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 Vol.7, pp.78-90, 1977.
- [14] a. Tampoe, M.,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555, pp.108-109, 1989.
b. [日]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史角度看南亚、东亚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15] 同[14]b。
- [16] a. 福建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b. 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第86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年。
c. 国家文物局编:《海上丝绸之路》第62页,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 [17]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
- [18] a.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
b. 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19] 李铎等:《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
- [20] 汪勃:《再谈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考古》2012年第3期。
- [21]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p.13,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22]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6-277,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23]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6, Fig.199-D,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24] Chittick, H.N.,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74.
- [25] 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6*, p.15, 1971.
- [26] Horton, M. 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27]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28] Philon, H.,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6,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1980.
- [29] 同[4]。
- [30] Philon, H.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5,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1980.
- [31] 同[27]。
- [32] Philon, H.,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83,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1980.
- [33]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8,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34] Lankester Harding, G., *Archaeology in the Aden Protectorates*, p.18, London: H.M.S.O, 1964.

- [35]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36] Hansman, J., *Julfar, an Arabian Port*, p.52,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85.
- [37] Whitcomb, D.& Johnson, J. H., *Quseiral-Qadim 1980*, C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Reports (ARCE), Vol.7, pp.134-135, 1982.
- [38]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39] Chittick, H.N.,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255,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74.
- [40] a.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本文所用数据采自表格14, 马克·霍顿将伊斯兰釉陶器分为十组, 其中第3组 (Samarra Lustre)、第6组 (Green-Glaze incised)、第8组 (underglaze painted polychrome)、第10组 (Islamic fritwares) 在东非沿海地区出现极为零星, 本文中未予介绍, 在表一中均归入“其他”类。
- [41] a.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第360、361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b. [肯尼亚] 佐伊·马什: 《东非史简编》第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
- [42] 同[40]。本文表二中的瓷器种类需要略作说明。橄榄绿釉罐原文为Olive-green jar, 产地未能确定, 笔者对上加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考察, 但因实物破碎, 且报告无彩色照片, 因此未能一一对应; 浅棕釉青瓷原文为Light-brown-glaze greenware, 马克·霍顿推测是龙泉瓷器的一种; 模制白瓷原文为Moulded whiteware, 推测是福建德化窑产品; 灰绿釉器原文为Sage-green glazed greenware, 马克·霍顿推测是早期龙泉瓷器的一种; 白瓷, 据报告应指近似于现代陶瓷的可归入“porcelain”的白瓷产品。
- [43] 秦大树: 《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观察》, 见《2011古丝绸之路: 亚洲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1~82页,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3年。
- [44] Horton, M.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394-40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 [45] Chittick, H.N.,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74.
- [46]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Fig.6-B,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47] Regina Krahl, et al.,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169, 2010.
- [48] a. 谢明良: 《铅釉陶器的世界》第197页, 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b. 同[33]。
c. [英]亚瑟·莱恩著, 程庸、王安娜译: 《早期阿拉伯陶瓷》第19页“译者观点”, 学林出版社, 2014年。
- [49]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p.12,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 [50] 谢明良: 《中国陶瓷剔花装饰及相关问题》, 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八期, 2015年。
- [51] Wilkinson, C.,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p.5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3.
- [52] a. Lane, A., *Early Islamic Pottery*, pp.9-10, London: Faber & Faber, 1947.
b. Watson, O.,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373, London: Thames&Hudson, 2004.
- [53] Morgan, P., New thoughts on Old Hormuz: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Hormuz Region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ran*, Vol.29, pp.67~83, 1991.
- [54] a. 中国硅酸盐学会: 《中国陶瓷史》, 文物出版社, 1982年。该书具体论述了在元青花瓷器中, 有众多器物采用苏麻离青生产。
b. 黄薇、黄清华: 《元青花瓷器早期类型的新发现——从实证角度论元青花瓷器的起源》, 《文物》2012年第11期。该文讨论元青花的起源, 也提到了对西亚进口料的使用。
- [55] 同[18]。

(责任编辑 郭晓涛)